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著

失蹤者的足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D652
20145

失蹤者的足跡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印紅標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389-7

2009 年第一版

2014 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Footprints of the Missing: Thoughts of the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By Yin Hongbiao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389-7

First edition 2009
Second printing 201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 言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初和1976年行將結束之時，北京天安門廣場都曾經出現過以青年為先鋒的震驚中外的羣眾運動場面。1966年，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揮動「紅寶書」¹，高呼「萬歲」，接受偉大領袖的檢閱，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76年，熱血沸騰的青年不顧政治高壓，以詩歌等形式譴責四人幫，喊出「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²的抗爭之聲。文化大革命一首一尾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兩件歷史事件，象徵性地說明：十年時間，這一代青年人的政治思潮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熱烈地擁護、激情滿懷地參加文化大革命，到質疑和憤怒聲討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幫。

這是一代青年人用青春和熱血寫下的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其中有狂熱的鼓噪，更有艱難的理性反思，以及為了伸張正義和真理的勇敢吶喊。然而，這些多姿多彩的思想活動，卻至今沒有在中國（內地）的思想史研究中留下應有的痕跡。曾經喧囂一時的紅衛兵思潮被刻意迴避，而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的那些富有思想價值的、開啟了文革後思想先河的精神探索，在當年就是暗中進行、鮮為人知的，文革之後更不為人提及。只是見證過那段思想歷程的人，才發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感慨。³

任何一段精神歷程都有其價值，都不應當被掩蓋，被遺忘。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正是因為知識和經驗的積累，才使每一代人都可以繼承前人的智慧，不致一再從零開始。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給後人深刻的教訓，而思想先驅者掙脫精神枷鎖的勇敢探索，儘管稚嫩卻寫下了尋求解放的熱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國人羞恥的空白，也給後來者以久遠的啟示與激勵。為此，本書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與思想探索，試圖追尋其蹤跡，梳理其脈絡，嘗試揭開一段「失蹤」的歷史。

一 主題

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1966至1968年)是羣眾運動和社會思潮洶湧澎湃的時期，青年學生以紅衛兵的身份，運用大字報、演講、報紙刊物等方式，圍繞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形式、意義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論述和爭論。在隨後的數年裏(1968至1976年)，大批青年被安置到社會底層。變化莫測的政治風雲，祖國、人民和個人命運的艱難坎坷，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給他們提出了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個政治高壓、言論和思想凋敝的嚴冬時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百折不撓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會問題，形成意識形態堅冰下的思想潛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結束後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於知識分子在曠日持久的精神壓抑中，難於進行獨立的思想探索，長年處於失語狀態，從而使那些學養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動，在中國民間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儘管青年人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卻反映了很多中國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誤區，而後一步步衝破思想牢籠，重新樹立獨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從而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歷史中沉重而閃光的一頁。

目前，中外學術界對於中國思想史上這一重要領域的研究十分薄弱，缺乏對基本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梳理，更罕見系統的理論論述。特別是對於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高潮過去之後，即1968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探索，人們至今所知無幾，相關研究更幾乎是空白。因此，對這一領域歷史事實的考察和整理、理論的分析和論述，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

鑑於這個領域學術研究的現狀，本書的首要和主要內容，是依據盡可能翔實的資料，揭示文化大革命時期青年思想活動的歷史事實。其次是對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中出現的不同傾向和思想流派進行梳理。最後是探討這些思潮和思想探索在思想史上的意義。歷史資料的發掘和梳理是本書的重點。

二 概念：時代、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

本書以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為主題，因此首先需要說明與主題相關的幾個概念。

本書沿用中國大陸通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說法，考察1966年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潮，同時注意到前兩三年（1966至1968年）與後七八年（1968至1976年）的顯著區別。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體階段，後者可以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後續階段。⁴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階段，羣眾可以運用大字報、報刊、集會演講等相當廣泛的「大民主」方式，在中央認可的範圍內發表言論。1968年秋季以後，羣眾不再享有以「大民主」方式自主發表言論的有限機會，而處於強求一致的思想高壓之下。儘管如此，仍然有一批青年人保持着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強烈關注和興趣。

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於中共黨內鬥爭，十年間高層領導的政治鬥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並常常被賦予意識形態的解說。中央要求羣眾與最高領袖保持一致，上層鬥爭不時需要在羣眾中找尋支持，也往往關乎羣眾的切身利益，這就刺激了羣眾對政治和理論問題的關心。與此同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種種矛盾和弊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被激化，以擴大和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尖銳地擺在世人面前，觸動着具有強烈社會政治情懷的有志青年。凡此種種，構成了民間思潮非同尋常的環境和社會基礎。

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想者的主體，是在紅衛兵、上山下鄉等運動中經歷了大起大落人生磨練的「老五屆」和「老三屆」青年。這是在新中國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一代人。首先，他們出生在二十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在新中國接受學校教育，基本上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接受政治教育，受到毛澤東的理論和觀點（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的深刻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一代人的主體是大學和中學的在校學生，其中在校大學生按照正常的教學計劃將先後在1966至1970的五年間畢業，故被稱為大學「老五屆」學生，在校中學生按計劃於1966至1968三年間初中或高

中畢業，故被稱為中學「老三屆」學生。此外，與「老五屆」或者「老三屆」學生年齡相當的社會青年，以及年齡稍長或稍幼的一些青年人，也是當時思想活動的參與者，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思想特徵。

其次，經歷了政治運動和動亂，湧現出一批具有相似的人生閱歷，熱心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青年。文革初期他們普遍參與紅衛兵運動，經歷或者目睹了政治動亂的大風大浪。紅衛兵運動過後，他們的命運繼續因政治運動而動盪不定。「老五屆」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農場、工礦參加體力勞動一段時間，接受「再教育」，然後分配做基層的專業或一般工作。「老三屆」中學畢業生則大部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被送到農村、邊疆生產建設兵團或農場落戶，成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少數在城市做工或者到部隊當兵。1971年林彪垮台以後，隨着政策的調整，陸續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被抽調到廠礦或者返回城市，也有不少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在「大返城」的風潮中回到城市。這一代青年的命運與國家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由於缺少學習科學技術的條件，加上主導一切的政治鬥爭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他們中間不少好學者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產生了興趣並進而作出思考。

十年間，青年人對社會政治及意識形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思考、探索、論述、爭論，涉及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共黨內鬥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農村及教育等方面的體制和政策等十分廣泛的領域。十年中，青年思潮的基本方向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狂熱地擁護和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努力學習和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簡稱「繼續革命理論」），到質疑和批判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官方意識形態。

思潮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思想活動，而本書論及的對象，不僅包括造成顯著社會影響的思潮，同時也重視當時尚未廣泛流傳的分散的思想探索，視後者為思潮的一種特殊形式和組成部分。這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環境和青年思想活動的特點決定的。

在1966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喧囂似大潮洶湧，

在1968年秋季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則如潛行的涓涓細流。在潛流時期，青年思想活動通常是秘密或者半公開的，局限於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即上海學者朱學勤所稱「思想村落」⁵之中，不為外人知曉。然而，正是在這個思想潛流期，青年思潮實現了基本方向的轉變，孕育了1976年清明節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並為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的春天做了準備。

文革期間的思潮形形色色，本書集中考察當時青年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潮，而較少涉及青年在文學等其他方面的思潮和活動。

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歷史條件，本書着重考察具有較強獨立思考特徵的青年思想。對於紅衛兵運動時期的思潮，本書注重青年自主解釋和發揮文化大革命理論，表現出思想個性的言論。對於羣眾運動退潮以後的青年思潮，注重考察和分析與官方宣傳相區別，被視為異端的青年思想，而較少述及緊跟當時官方主流觀點的言論。

三 國內外研究狀況

目前國內外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研究尚屬薄弱。中國內地沒有出版相關的研究專著，論文也很少見。1990年代，徐友漁和宋永毅在香港分別出版了關於紅衛兵及青年異端思潮的著作，考察和分析的重點是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而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之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想狀況則涉及不多。就筆者接觸的資料而言，西方學者對紅衛兵運動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對紅衛兵思潮以及紅衛兵運動結束後的青年思潮，所做的專門研究並不多。

中國學者徐友漁1999年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⁶，是迄今為止關於紅衛兵思想和精神素質研究的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著。徐友漁從紅衛兵精神素質的視角，揭示紅衛兵運動的行為模式、派系和地方差異、思想類型及文革前後的變化，對紅衛兵思潮做了比較深入的理論性分析。徐友漁提出：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在運動中策略的運

用，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的矛盾，是紅衛兵造反行為、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的基本原因。這部專著以精神分析和理論評論見長，但其視角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思潮，因此以本書研究的角度觀察，這本專著對紅衛兵思潮本身的考察還比較籠統，例如沒有區別造反派與「極左派」紅衛兵。此外，對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長達八年的青年思潮，僅作為紅衛兵運動的後果簡單提及。

旅美華人學者宋永毅、孫大進1997年編著，在香港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⁷一書，以資料為主，兼作介紹和評論。書中收錄了很多紅衛兵運動時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史文獻，全書八成以上的篇幅是文獻資料，有重要的資料價值，但是紅衛兵運動結束以後的資料，只有廣州「李一哲」大字報一篇。宋永毅在這本書中對「異端」思潮進行了考察和十分精彩的分析，在這個領域有開創性的意義。此外，徐友漁和宋永毅還發表了一些學術價值很高的研究論文。⁸

其他一些中國學者也對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做過研究和評論。丁東對民間思潮的研究和評論涉及到文革期間，特別是上山下鄉運動以後的青年思潮和思想探索，但是他的文章多為散文、隨筆和思想評論。⁹

國內外學者關於紅衛兵運動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到紅衛兵思潮，並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¹⁰一書，涉及湖北極左「新思潮」的情況，他的英文論文〈文化大革命新思潮〉(“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¹¹，對極左思潮的發展做了考察。清華大學唐少傑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一書，¹²涉及清華大學造反派的思潮論爭。此外，筆者也發表過一些與青年思潮相關的論文。¹³這些研究都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學術基礎。

西方學者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領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關於紅衛兵運動的論著，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和社會心理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如美國華人學者陳佩華的《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Children of Mao :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¹⁴。美國學者對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集中在幾篇有代表性的文獻上，例如美國學者安格 (Jonathan Unger) 關於湖南楊曦光的論文〈楊曦光向何處去？紅色資本家和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動亂〉(“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¹⁵、陳佩華、羅思典 (Stanley Rosen) 和安格編輯的關於廣州李一哲的論著《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李一哲論爭》(*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¹⁶、羅斌 (Robin Munro) 翻譯介紹雲南陳爾晉的《中國：十字路口社會主義，非官方的無產階級民主宣言》¹⁷。就筆者所知，西方學者還沒有關於 1966–1976 十年期間青年思潮方面較為有系統的研究專著。¹⁸

四 資料來源

文化大革命中青年思潮的資料原本相當豐富，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可以提供給研究者的資料卻十分缺乏，這是長期制約學術研究的最主要因素。筆者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於查閱、蒐集、整理文字資料和口述資料。

1 文字資料

原始的文字資料保留了文本的原貌，是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資料依據。對於文字資料，當然也要進行必不可少的文本考訂。

在文字資料方面，1966 至 1968 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資料與 1969 至 1976 年期間的資料，有明顯的差別。

(一) 1966 至 1968 年羣眾運動高潮時期的文字資料有以下幾類：

(1) 羣眾組織出版物，俗稱「紅衛兵小報」。1966 至 1968 兩年多時間內，羣眾組織或者個人以多種形式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其形

式包括大字報、報紙、刊物、傳單、小冊子、專集、演講、會議發言、廣播等，其中大批小報、刊物之類的紙質資料保留至今。

筆者本人陸續蒐集了一些紅衛兵小報，並有幸閱覽北京大學圖書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 (East Asian Librar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藏的羣眾組織出版物，以及美國華盛頓「中國研究資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和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編輯出版的影印文革資料集、美國華人學者周原和宋永毅編輯出版的影印資料《新編紅衛兵資料》，以及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筆者在蒐集過程中，得到了很多學術界前輩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及幫助，從而大大充實了本書的資料基礎。

(2)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官方報刊雜誌，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及地方報刊發表或轉載的很多紅衛兵和青年的言論。

(3)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學者和海外華人學者編輯出版的資料集。一些文革資料集收錄了紅衛兵運動時期青年思潮資料，其中重要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輯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¹⁹、美國華人學者宋永毅等編寫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²⁰ 等。

(二) 1969至1976年期間的青年思想資料。由於這一時期青年的思想活動基本處於被壓抑、被禁止的狀態，所以這部分資料非常難於蒐集。現在能夠看到的文字資料，主要有以下幾個來源：

(1) 文革期間公開貼出的大字報等資料。今天研究者能夠讀到的這類資料，多來自私人保留下來的批判資料。如中共廣州市委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編印的批判1974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的資料，附錄了這張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全文。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編印的批判資料，加按語全文印發了1975年南京青年徐水良貼出的大字報。這些批判資料原則上是要求在使用過後收回的，

但是由於發放範圍廣泛而有個別資料被羣眾個人保留至今。這是本書思潮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

(2) 文革結束以後，在平反昭雪冤假錯案的過程中披露的思想資料。例如上海青年王申酉的資料是在1980年為王申酉案平反過程中，由《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金鳳等人從公安部門的檔案中抄錄出來的。這類資料有些在平反時退還給受害人，有些則沒有退還。

(3) 在文革期間已經成文而沒有公開發表，到文革以後才公開發表的上書、日記等資料。例如1976年春季雲南青年陳爾晉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上書〈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1979年發表於民辦刊物上。又如北京知識青年盧叔寧的日記，在2000年得以發表。²¹這些資料雖然在當時沒有造成社會影響，但仍然是記錄了青年思想的資料。

(4) 文革結束後海內外出版的收錄了青年思想資料的書籍。這類資料集當中，重要的有余習廣主編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²²，徐曉主編的《民間書信》(書中收錄了知識青年的通訊，其中幾篇書信涉及社會政治思考)²³，以及金鳳、丁東編註，在香港出版的《王申酉文集》²⁴。

2 口述資料

除了文字資料之外，口述資料也是研究青年思潮的重要資料。口述資料可以印證和說明文字資料的背景，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特別是對了解思潮背景、思想活動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筆者盡可能多地走訪與青年思潮有關的當事人。鑑於口述者的政治立場可能有很大的差異，筆者的訪問僅限於了解他們在文革期間的思想活動，不涉及其當今觀點。

中國內地和香港發表或者出版了一些涉及青年思潮的口述資料和回憶，其中重要的有徐友漁本人的文革期間的思想傳記《驀然回首》²⁵、徐友漁編輯的口述訪談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²⁶、徐曉等人編輯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米鶴都的《紅衛兵這一代》²⁷。

一些個人的回憶涉及了青年思想的情況，如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²⁸、楊瑞的《吃蜘蛛的人》²⁹和梁恒的《文革之子》³⁰。

一些報告文學依據對當事人的訪問，記錄了青年思想者的歷史，引述了相關的資料，如《牟其中》³¹一書的作者袁光厚根據對牟其中的訪問，記錄了牟其中等青年人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歷史，並且引述了文革期間作為批判資料印發的馬列主義研究會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部分文字。該文章的作者劉忠智在回答筆者的訪問時說，袁光厚的描述是可信的。

筆者屬於本書所講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一代，因而本人的耳聞目睹和親身體驗對於準確把握歷史事實頗有幫助，同時本人盡力保持學者的客觀立場，避免因個人情感而影響到觀察和敘述的客觀準確。

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青年思潮的資料，至今仍存放在政府機關或者單位的檔案裏，沒有開放，有些則分散在民間。本書僅依據筆者所接觸的有限資料，遺漏之處以及因資料缺乏而造成的片面論斷在所難免。相信隨着民間資料的進一步蒐集和檔案的開放，有關資料會逐漸豐富起來，朱學勤先生所說「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全貌最終會呈現於世人面前。

五 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主要運用歷史學的方法，注重資料的考訂，包括對文字資料文本的考訂和對口述資料的考訂。考慮到口述資料在還原歷史原貌方面的局限，在資料的運用方面，會以文字資料作為考察思潮和立論的基本依據，只是在文本資料不足時，才輔助以口述資料，並同時盡可能對口述資料進行核實。在描述思想者的活動和社會背景時，則更多地依據口述資料。對於缺少文字記錄而又不能不提及的內容，才審慎地以口述資料為依據，並且予以說明。對於一時找不到文本依據而又難於準確把握的思想，只好暫告闕如，留待以後考察。例如廣州青年劉國凱於1971年底寫成的《文化革命簡

析》，曾經油印成小冊子在朋友中傳閱，1980年底經作者修改以後發表於民辦刊物，帶有文革後修改的明顯痕跡。儘管筆者設法訪問了作者和當年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士，但是終因缺少1971年的版本而只能放棄。

本書試圖依據歷史資料考察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青年思潮狀況，勾勒出思想流派的主要觀點、演變的歷史和邏輯聯繫，對比分析各主要思想流派的特點，探討思想活動的存在方式，以及思潮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淵源等。

本書運用歸納、實證的方法，努力從紛雜的資料中，梳理出思潮發展的脈絡，提出理論性的分析，而無意以現有的理論框架整合歷史資料。

本書的敘述以時間先後為序，上編為紅衛兵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時間是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至1968年紅衛兵運動結束。下編為上山下鄉和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從1968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這是長達七八年的漫長時期，其開端是紅衛兵運動的退潮和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始；其結束前夕，發生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反抗「四人幫」的四五運動。

註釋

1. 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毛主席語錄》稱作「紅寶書」。
2. 〈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載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頁281–282。
3.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頁321–338。此文是應徐友漁之邀撰寫，先發表於《讀書》，1995年，第10期。
4. 中國和海外文革研究者對於文革的時段有不同的看法，中共中央所主張的1966至1976年「十年文革說」，是中國國內通行的說法，此外是將文化大革命限於1966至1969年的「三年文革說」，以及1966至1968年的「兩年說」。

5. 同註3。
6.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7.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8. 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歷程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當代中國研究》(紐約)，2005年第4期；宋永毅：〈派別、實事與文革異端思潮〉，《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12月號，頁119–124；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台灣大學政治系編)，第12期，1997年5月，頁10–16。此文的修改本以「蕭瀟」為筆名，以〈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為標題，轉載於電子刊物《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專集」(28)，1997年10月；此文的刪節本以筆名蕭瀟，題目〈書的軌道：一部精神閱讀史〉，轉載於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徐友漁：〈異端思潮和紅衛兵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香港)，1996年10月號，頁52–64。
9. 丁東：《冬夜長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10. 王紹光著，燕青山、易飛先、張愛茹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羣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11. Shaoguang W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 21(1999): 197–217.
12.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13. 印紅標：〈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北京)，1997年第4期。
14. 阿妮達·陳(Anita Chan)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阿妮達·陳即陳佩華。
15. Jonatho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 1991): 3–37.
1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e, 1985).
 17. 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trans. and introduction. Robin Munro (London: Verso, 1984).
 18. 以下一些英文著述應當與本研究相關，但是筆者無緣閱讀：Gregory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19. 遇羅克著，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20. 同註7。
 21.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
 22.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3. 徐曉主編：《民間書信——中國民間思想實錄》(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24. 王申酉著，金鳳、丁東編註：《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25. 徐友漁：《驀然回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6. 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27.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此書提供的資料，主要部分是由唐燦、米鶴都、陸建華和筆者四人於1985年完成的一項課題中的訪問資料，米鶴都添加了他本人的其他一些訪問資料，編寫了這本以資料為主的書。
 28.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29. 楊瑞著，葉安寧譯：《吃蜘蛛的人》（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1999）。
本書英文原版為：Rae Yang, *Spider Eaters: A Memo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0. 梁恒、朱迪思·夏比羅 (Judith Shapiro) 著，彭萍等譯：《文革之子》（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原書名為：*Son of the Revolution*。
31. 袁光厚：《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